

从国际大局看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文 / 王缉思

一、国际大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

从 1894—1895 年的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结束的 50 年间，国际政治的时代特征是西方大国在全球争夺霸权、领土、自然资源，实行武力征服和殖民统治。惨烈的战争接连不断，许多国家生灵涂炭。日本作为学习西方的后起大国，加入到霸权国家的行列。中国则处在丧权辱国、国土分裂、政权分割、内战不断、民不聊生、民族生死存亡未卜的境地。以苏联为基地和旗帜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则方兴未艾，试图推翻整个国际秩序，埋葬世界资本主义。20 世纪上半叶，虽然各国也曾经高唱和平，人们也期待和平，但是却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

中日之间那段不堪回首的痛苦历史，就是发生在那样一个世界大背景之下。中国人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固然不能不追究具体是哪些国家、社会集团和个人应为战争灾难负责；但是更应该反思的是，那半个世纪中间，究竟有哪些因素相组合，使整个世界陷入混乱之中，使人类文明史蒙受耻辱。如果这些因素在今天重新组合起来，世界历史的车轮会倒转一百年，也就不会有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20 世纪 50—60 年代，中日两国陷入了相互隔绝的状态。这又是国际大环境造成的。两国分属于不同的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阵营。虽然热衷于中日交流的人士很多，历史贡献很大，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毕竟发生于中美关系缓和之后。国际战略格局变了，中日美三

国都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略威胁。这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国际背景。

同时，国际形势的缓和，使全球化的潮流得以迅速推进。70 年代末中国领导人痛切感觉到经济的落后，特别是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差距，于是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而日本高速发展的经济和技术进步，同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恰恰是契合的。于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十来年里，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战略形势像两个车轮，将中日关系推向迅速改善的轨道。

从中日关系本身的动力而言，冷战结束应对双边关系影响不大。然而 1989 年的天安门风波仍然造成了冲击。日本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取消对中国的制裁，是对华关系中的一个积极因素。但是不久之后，中美关系的严重挫折再一次波及中日关系。1995 年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后，中美关系陷入僵局，台湾海峡局势一度紧张。恰恰在这个时期，日美安保条约重新定位，日美安全同盟得以加强，这被普遍认为是针对中国的。从此之后，美日加强军事合作，包括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成为中国十分关注的国际安全问题。

中日美三边关系的互动，成为三国的国际关系学者的一个研究重点。在整个 90 年代，中日关系好于中美关系。进入新世纪，特别是美国将其战略矛头对准它所称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之后，中美关系相对稳定，而日中关系却一度陷入僵局。人们注意到，当中美关系恶化时，中日关系往往得以稳定，而中

* 本文选自作者 2008 年 9 月 14 日在日本创价大学的演讲，有删减。

日关系恶化往往发生于中美关系改善的时期。只有在最近的两年里,中美、中日关系才同时稳定。

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多边安全机制的探讨,以及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一方面使中日双方有了更多的接触、磋商、合作的渠道(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多边场合见面的次数,大大多于双边互访),使双方在关系冷却阶段也有沟通的机会;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的是,中日两国在多边国际舞台上也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于是,国际大局的演变,将继续对中日双边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二、当今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

那么,当前国际大局有什么特点,将来的发展趋势如何呢?

21世纪初国际政治的第一个特点是世界各大国在竞争中合作,以合作为主。

美国的软实力因发动伊拉克战争和其他一系列单边主义的国际行为而受到削弱,硬实力也在金融危机中大受打击,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尚未动摇。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在大中东地区,需要其他大国合作维持该地区的稳定,防止恐怖主义卷土重来。欧盟扩大之后,主要精力放在稳固内部,加强凝聚力,保持经济和社会融合的进度。尽管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出现分歧,美欧仍然维持同盟关系,北约也继续在安全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日美同盟是牢固的,日中关系在继续深化。俄罗斯、印度、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力量迅速增长,但它们各自的经济发达程度、社会治理能力和教育、文化、技术水平同西方国家和日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也越来越依赖于海外市场或能源供应,同时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内问题的解决。因此,虽然国际摩擦不断,但没有形成像两次世界大战前和冷战时期那样的敌对阵营的可能性。“新冷战”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本世纪初国际政治的第二个特点,是全球化的负面作用日益显现,全球功能性问题(functional issues)突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更为严重。

全球化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技术的平面扩散,使融入全球化的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增强,有利于避免大国对抗。但是,全球化加剧了两大失衡。一是世界经

济发展和财富分配的失衡,富国与穷国两极分化,各国国内的贫富悬殊持续扩大,金融资本加速流动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二是全球生态环境的失衡。环境恶化、气候变暖,呼唤人们提高能源效率,开发新能源,建设低碳经济,但是各国还远远没有为此做好准备,甚至没有取得思想共识,更谈不上全球合作机制的建设。

能源短缺、粮食短缺、环境恶化、气候变化、非法移民和难民、传染病扩散、跨境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分不开的。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组织和现存的全球合作机制,远远地落后于全球化的进程,出现了严重的“国际机制赤字”。

第三个特点,是世界范围的宗教复苏和民族主义上升。

冷战结束,意味着两大意识形态对抗的终结。但是人类历史从来都充满着思想激荡。人们在全球化带来的复杂矛盾中,依靠和寻找着精神依托和对群体的归属感。于是,在传统宗教的复苏中,一部分宗教势力复归到所谓“原教旨主义”,并得到部分群体的拥戴;而恰恰这些群体是自认为处于弱势的民族时,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就相互纠缠在一起,产生一些国家内部民族分裂的倾向,并受到国际势力的干预。在这种情形下,南斯拉夫分裂成若干独立国家。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都在与国内的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进行斗争,维护国内的统一与稳定。在基本上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如韩国和日本,民族主义情绪也在上涨。虽然宗教复苏和民族主义有增强某些社会的凝聚力的作用,但也可能被引导到破坏和平、稳定、繁荣的方向上去。

展望未来的国际政治演变方向,我个人有以下一些观察。

首先,世界力量中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在国际战略格局维持稳定的同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快速发展,墨西哥、南非、越南、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也在增强。他们可能在未来十几年的时间里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2020年以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应当会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可能同英国、法国相当;世

界经济将更多地依赖新兴国家来推动，原有的国际秩序会受到相当大的冲击。

其次，创建新的国际机制以处理金融安全和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稳定全球经济和政治，成为日益紧迫的任务。美国的实力未必会明显削弱，但在其对国际秩序的“领导作用”逐步下降的过程中，它将成为更为“孤独”的超级大国。日本和欧盟主要国家，可以说处在“后现代”的发展阶段，而美国的发展模式仍有活力，并以其丰富的国内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军事力量为支撑，因此在气候变化、地区冲突等一些问题的处理方式上同欧日产生矛盾。更深的矛盾则可能产生于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也可能产生于发展中国家内部。同时，各种非政府组织（包括恐怖组织）和跨国公司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扩大，个人通过网络技术也在发挥作用。如果国际机制的“赤字”不能尽快得到弥补，那么某些地区冲突、民族宗教矛盾就会失控，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也会愈演愈烈。

三、中日关系的新趋势与发展方向

在未来世界，不确定的因素迅速增加，原有的全球秩序、地区秩序必然会发生难以预测、难以估量的变化。当我们展望中日关系的未来时，眼光绝不能局限于两个国家内部和双边关系，而必须将国际大局作为重要因素来考虑。在这里，我提出一些个人的设想和思路，供关心中日关系的人士参考。

我曾经就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力量对比变化做过一些研究，初步结论是：用传统的“硬实力”标准（经济数字等等）衡量，中国的经济实力将在10年之内超过日本，在20年之内接近美国，同时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实力差距也会继续扩大。在这种力量对比趋势之下，按照传统的地缘政治思路，日本的自然选择是加强同美国的同盟关系，在同中国继续发展经济合作的同时，在战略上对中国保持警惕甚至牵制。

但是，当我们把实力的衡量标准从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力量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指标时，就会发现上述判断的缺陷。美国在应对全球化的负面冲击时，困难超过日本。中国则是三国之中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最为脆弱的国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人口增长、社

会矛盾的牵制，都使持续了30年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中共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任务，不仅是今后发展的方向，更是维持中国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之必须。中国不能以美国的高消费、高能耗的生活方式为楷模和实现现代化的标准，而更应当学习日本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技术密集型的发展模式，以此促进社会和谐及可持续发展。也惟有选择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中国才能真正崛起，并成为受到世界欢迎和尊敬的大国。

因此，中日关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能否在涉及未来全球秩序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携起手来，共同建设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国际机制。一直对中日关系造成困扰的双边问题，如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领土争议和东海大陆架的资源开发，仍然存在。但是，除了两国国内因素的影响之外，未来中日关系将更多地涉及多边和全球问题。具体包括：京都议定书的协议到期前后，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共识能否形成，中日在其中的各自立场和应起的作用；在世界经济发展放缓、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的条件下，中日能否合作，改进全球金融体制，防范金融危机；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如何推进，是否应当或者如何建立亚洲货币单位；朝核问题能否彻底解决，能否在六方会谈的基础上，减少安全威胁，商讨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创立；在全球能源供应链中，中日两国能否协作，促进共同利益；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改革中能否相互支持，等等。

我深信，把中日两国带入战争的国际环境已经远去。但是，前景并非都是光明的。在诸多挑战面前，中日两国政府之间应当加强战略对话，就前瞻性的全球治理问题和地区合作问题经常交换意见，凝聚共识。两国的民间团体，包括思想库和大学，也应当设立共同的研究项目，并且同其他国家的民间团体协调合作。把眼光放大放远，就可以避免被“一山不容二虎”式的思维方式所缠绕，使两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各自的独特作用和共同的积极作用。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本文责任编辑 李红）